● 世界史

试论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对待西学的基本态度^{*}

李 少 军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李少军(1958-),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 要] 日本人对西学的态度自 18 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而明治变革时期当政者与启蒙思想家对待西学的言行、这一时期西学传入并影响日本社会的实际状况等, 证明当时日本对西学的基本态度, 既非只重“技艺”, 又非由着重于物质技术层面逐步扩展到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 而是多层面学习与吸收; 日本当时存在的保守势力也不足以改变这种基本态度。

[关键词] 日本; 明治变革; 西学

[中图分类号] K 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5-0612-08

西学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是日本在明治变革时期^①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突出现象。围绕当时日本对待西学的态度问题, 我国学界流行一种看法, 认为其与中国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在思想上一脉相承, 都是过渡时期思想文化的二元性的反映”, “东洋道德与西洋技艺相结合”是“日本发展模式”; 或曰两者学习西方的内容都是从物质文化和科技逐步延伸到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和发展民族工商业^②。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有悖于历史实际, 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

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对于西学并非只重视“技艺”, 也不是以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作为出发点, 而是一开始就表现出多层面学习、吸收的基本态度。

西学传入日本, 可以上溯到 16 世纪前期, 而承认西人技艺优长、希望学习的言行, 至迟在 18 世纪, 就已多见于日本人的议论与记载。如 18 世纪初的幕府重臣新井白石写道: 西人之学, “惟精其形与器, 惟知所谓形而下者, 形而上者尚未得闻”^[1] (第 19 页); 到 1774 年, 著名通词吉雄永章为《解体新书》作序曰: “阿兰之国(即荷兰——引者)精乎技术也, 凡人之殚心力尽智巧而所为者, 宇宙无出于其右者也。……其精妙工致, 无不使观者爽然生奇想焉。……由是我就译家而学彼天文医术者, 固为不少焉”^[2] (第 319 页); 1783 年出版的兰学家大冢玄泽所著《兰学阶梯》又记载: “和兰之术, 我邦慕其奇巧, 效其制作, 拟制之物不少, ……人所稀见之物, 无不冠以和兰之名, ……另有号称兰癖之人, ……器械、图画之有可观者, 更不厌其价之贵, 务求逞其华美……世如此者已百有多年, 其间慕彼美之人何限”, 而他所抱憾者, 只是这些人并不真正懂得“择取彼长, 以补我短”的道理^[3] (第 334 页)。

值得注意的是, 自 18 世纪末期至 19 世纪前期, 一些日本人除了继续强调西人技艺先进之外, 还通

* 收稿日期: 2002-05-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0B75025)

过相当有限的海外信息渠道,开始了解到西人的优长并不限于技艺,而对其政教、民生发生浓厚兴趣,从中发现“善美”,明确表露出学习的愿望。如司马江汉在1796年和1805年先后撰写了《和兰天说》和《和兰通航》,称赞欧洲是“天下第一大洲”、“首开圣贤之道之乡”^[3](第501页),那里的人们“学格物穷理,不为天性空言、虚谈妄说,……万巧精妙,为他洲不及”^[3](第447页)。又如本多利明1798年写成《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将欧洲视为一个理想世界,认为那里的各种制度都包含了六千年的经验,即使中国也远远不及^[4](第93、95页),并且尤为推崇欧洲国家“以航海、运输、交易为国之首务”的经济政策,明言:“取西域之善美以为我国之助,乃吾本意”^[5](第103、106页)。还有在1832年至1838年间撰写了一系列涉及西方状况的文章的渡边华山,将基督教视为世界五种“圣人教”之一,赞赏俄国“政教文物臻于极盛”^[6](《再稿西洋事情书》,第46页),英国“最长于机巧,勉于工艺”^[6](《外国事情书》,第34页),西方国家以“造士开物之学校”为政事之本,人们的“穷理”精神不仅投向对于自然的研究,而且贯穿于对人间“事理”的把握,导致“今之地球上无一地不属于欧罗巴洲所有”^[6](第47-49页)。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固守锁国政策的幕府流于“井蛙之见而不自知”,“以三代缓服之制与秦汉御戎之论论今,亦如胶柱鼓琴”^[6](《慎机论》,第69页)。

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传来,特别是1853年美国舰队威逼日本打开国门之后,日本受到巨大冲击,学习西方长技、制造洋式船炮迅速成为幕府与众多藩国统治者的共识,并被付诸实施;佐久间象山还提出了有名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命题,认为来自西方的“推算重力几何详证之术”是“今之所谓儒者”必须“究而悉之”的学问^[6](《省濶圖》,第415页)。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但在我国学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在同一时期,一些日本人对于西方政教与社会经济表现出较以往更大的兴趣,在这些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如日本近代先驱思想家横井小楠,将西方社会的“政法治术及其他百般技艺器械等”都纳入视野,对西方国家的近代政体大加赞赏,认为符合“三代治教”,并据以批评日本自身是“无政事之国”,主张取法华盛顿“取智识于万国,裨益政教”;他还将西方国家“以商贾立国”、盛行机器生产、广泛进行对外贸易充分肯定为“经纶之功业”,并与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相对照,痛感落后,主张学习西方迅速转变经济政策^[7](第39、454、40、909、95页)。

又如幕府向荷兰派出的留学生西周助与津田真道,于1863年抵达莱登大学后,即表示:日本人不仅要学习外国的语言、史地和自然科学,也要研究“对于增进与欧洲各国关系,且为内政与各种设施的诸多改良所更加需要的学问”,此外“笛卡尔、洛克、黑格尔、康德所倡所道者……于我国文化之发展裨益不小,……即使其中之一端,亦欲排万难以学之”^[8、9](第165-167页)。事实上,他们在莱登大学学习的正是今天所谓西方近代人文社会学说(包括法学、经济学、统计学、哲学等)。

必须指出,西周与津田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1860年至1867年先后3次赴美国与欧洲的福泽谕吉,也同样高度关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主动向西人请教有关政党、议会、法律、金融保险与邮政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并购买了不少相关书籍,回国后即据以撰写《西洋事情》一书,“传播西方新思想”^[9](第291-293、320、322页)。此外,任职于幕府洋书调所的加藤弘之,钻研德国政治学、道德学、哲学等方面著作,“悟西洋各国之风俗、政治等有远优于东洋者,尤其发现有所谓立宪政体,……乃东洋自古未有之良制,东洋专制国远不能及”,因而在1861年撰写《邻草》,“比较东西方政治之良与不良、正与不正,论述我邦设立政体亦须模仿西洋之因由”,成为日本“论述西洋政体之嚆矢”^[10](《经历谈》第477-478页)。而同在洋书调所的神田孝平,则认为吸收西学之“教科”、“政科”(包括法学、统计学与经济学)、“理科”、“医科”、“文科”是“国家之急务,乃学者之不可忽视者”,而他本人主要致力于吸收西方近代经济观念,因此在1861年就写出了鼓吹“以商立国”的《农商辩》,后又将阐述自由主义经济观点的英人著作荷文本转译为日文《经济小学》,于1867年出版^[11](第14-15、138-139页)。还有1867年至1868年随留学生赴英的中村敬宇,主要致力于了解欧美“诸国之政化学术”,研究其“性灵之学”(包括“人伦之学,政事之学,律法之学”等)^③,深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迅速转变了旧的观点,为后来成为启蒙思想家准备了条件^[12](第236-

247页)。还有对促进日本工业化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涩泽荣一,1867年后也在欧洲逗留近2年,考察了欧洲各国的近代文明,尤其是与产业、经济相关的制度与设施,深刻认识到只有像欧洲各国那样发展工商业、使民间工商业者成为社会中坚,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这为他后来致力于引进西方企业制度、以主要精力促进民间近代经济力量成长奠定了思想基础^[13](第305-307页)。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即使是一些幕府当政者,也开始将其目光投向西学中的政教:早在1841年,幕府就令所辖天文方翻译荷兰的政书与兵书^[3](第677页);前述西周与津田真道在荷兰学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幕府所赋予的使命,故他们学成回国后,幕府当政者颇满意他们对荷兰“政体状况”的深入了解,认为其学问“关系国家之强弱贫富”,在委以重任的同时,令其翻译所学内容;1867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倒幕运动,还专门向西周及法国驻日公使了解欧洲的政治组织、官制等,试图从中吸收一些东西,改革幕藩体制,在天皇之下设立上下两议院^④。

上述情况表明,认为西学优长只在于“技艺”的观念在日本占压倒地位,主要是18世纪末期以前。而在那以后,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文明中的制度、精神层面愈来愈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教、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强烈,所谓“东洋道德与西洋技艺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即使对照此时日本的情况,也是不能吻合的。

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层面吸收西学的态度,决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是逐步由物质技术转向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

从当权者来看,明治政权刚刚成立,就颁布了有名的“五条誓文”,其中一条即为“求智识于世界”。这里所谓“智识”,并无特别限定,决非“技艺”所能涵盖。而之所以将“求智识于世界”确定为基本国策之一,是因为发动维新的当政者明确认识到“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概超绝我东洋”,“有志于将此开明之风移于我国,使我国速进步于同等之化域”^[14](伊藤博文在1872年致岩仓使团首脑人物的信中的言论,第31-32页)。正是基于这种观念,1871年,明治政府要求赴欧美的岩仓使团在致力于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同时,深入考察西方最先进国家的“国体、诸法律、诸规则”,探求其中具有普遍意义而可以适用于日本国民的“方法”,并开列出需要考察的具体项目,包括“制度与法律之理论及其实际运用”,“外国事务局(指外交机构——引者)、议事院(指议会——引者)、裁判所(指法院——引者)、会计局(指财政机构——引者)等之设置及其处理事务情况”,与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保险、贸易、交通、邮政电信、工厂相关的法则、运作方法及其实际状况,各国教育的各种规则、国民教育的方法、兴办各类学校的办法及各学科的顺序等等^[15](第162页)。这清楚地表明,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希望向西方学习的东西,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并非只以物质技术作为立足点。也正因为这样,其成立后不久,还征召以往隶属于幕府机构、对西方近代人文社会学说造诣最深的福泽谕吉、神田孝平、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等人,予以显赫地位,即使像福泽那样拒绝进入官场,也支持其以在野身份传播西方近代人文社会学说^[16](第15-110页)。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福泽谕吉一类人成为启蒙思想家,大力推动日本社会的“文明开化”,在传播西学的同时,更加旗帜鲜明地鼓吹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精神的重要性。如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并进一步指出:

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

……

日本……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办法……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17](第9,24页)。

又如中村敬宇,强调西方的“技艺”乃至一些制度只是“枝叶之美”,日本更需要学习的是作为其富强之基的“教法”为此,他于1871年推出根据英人斯迈尔兹所著《自助论》翻译的《西国立志编》,并在序中

写道：

谓西国之强由于兵……是大不然也。夫西国之强，由于人民笃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由于政宽法公。……人人品行正则风俗美，风俗美则一国协和、合成一体，夫强何足论哉^[12]（第250-251页）。

在明治变革时期脱颖而出的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也指出：

当今西洋文明之气运东渐，乃有形者至无形者均当起一大变革之时也。

在他看来，日本当时在“无形者”方面虽然已有很大进步，但还是面临“一种障碍物”，吸收西学不如“有形者”方面来得迅猛，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18]（第142页）。

二

考察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对西学的基本态度，只看明治政府当政者和启蒙思想家的言行还是不充分的。这里，再从当时西学传入日本的实际状况来加以说明。

首先，为了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日本社会从上到下高度重视、大力推动与近代科技相关的西学的传入：以往德川幕府已经采取的聘请西方专家学者传授科技、对外派遣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的措施，由明治政府更加强有力地推行；此外，随着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近代科技知识（涉及数、理、化、生）的传授列入中小学主要课程，大学逐步设立起医、工、理、农学科体系，从主要传授应用科学发展到应用与基础科学并重；从1879年起，与近代自然科学相关的各种学会纷纷成立，它们出版学术刊物，并面向大众进行科普活动；如此等等^⑤。应该说，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对于西方近代科技的吸收，有效地配合了它的工业化进程。

其次，明治政府建立一系列近代制度，几乎都从西方现行制度中寻求样板与借鉴：

在建立近代法律体系方面，“借助于欧美法律专家、主要以欧洲大陆法为样板”，将西方各国的法律大量译为日文^[19]（第355页）。

在建立近代教育体系方面，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彻底了解欧美制度的必要”，1869年专门为此设立了“制度取调所”，而1872年颁布的“学制”，则“参酌了西洋各国（法德荷英美俄等）的制度，采纳法国制度尤多”^[20]（第171、172页）。

在建立近代军制方面，早在幕末时期，横井小楠就主张，新式海军的建设，“一切规定，可参照西洋之法例推行”^[7]（第21页），到明治二年（1869年），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又围绕兵制改革提出“陆军当前取法国之式”的建议^[21]（第151-152页）。事实证明，这些主张都化为明治政府的政策，它所建立的“海军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复制品，陆军明显受法国陆军的影响”^[22]（第91-92页）。

在建立近代经济制度方面，明治政府将“求得保护人民之实”作为“至要至切”的“急务”，在大力推动近代产业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占有宇内运漕之利”（即取得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23]（第561-566页），这些是与政府要人在欧美的切身体验直接相关的，是学习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产物。此外，对日本近代经济发展全局影响至深的地税改革，原本是“作为设立向欧美之‘列国公法’看齐的税法之一环”来考虑的，而其主要设计者则是日本近代最早译介西方经济学说的神田孝平，这些都说明这一重大举措与取法西方经济制度的密切关系^⑥。再就近代企业制度（主要是股份公司）与金融制度（银行）的建立来说，都具有浓厚的移植色彩：有关公司的知识从幕末就开始传入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很快就依据这些知识建立通商与汇兑公司，同时，为了推动民间创办股份公司，还通过大藏省出版书籍介绍相关知识，其中包括涩泽荣一根据其在欧洲所见而撰写的《立会略则》，福地源一郎编译欧美学者的相关论述而成的《会社辨》。到1887年以后，从西方移植的股份公司制便在日本完全确立起来^[24]（第34-68、715-719页）。

至于银行制度，则是1870年后伊藤博文等到美国直接考察金融制度，并从英国聘请金融专家到日本，听取其意见，经过比较权衡，确定以美国银行制度为蓝本之后，开始在日本建立起来的。1881年明治政府

整顿金融、成立央行性质的“日本银行”时,也是以比利时中央银行为样板^[25](第16,24,58-59页)。

第三,迅速而大量地译介西方近代人文社会学说: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897年,日本人翻译的有关近代政治学说的西书约有170种,涵盖了17、18世纪至19世纪80年代欧洲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涉及宪法、议会制、内阁制、主权论、政党论、地方政治、政治史、政治与法的思想等方面^[26](第56,62页),其中包括加藤弘之根据布伦奇利鼓吹立宪主义的《一般国法学》翻译的《国法泛论》(1872年起出版);中村敬宇根据穆勒著《自由论》译出的《自由之理》(1872年后多次出版);松岛刚根据斯宾塞著《社会静学》翻译的《社会平权论》(1881至1884年出版);何礼之根据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翻译的《万法精理》(1875年);中江兆民等根据卢梭著《社会契约论》翻译的《民约论》、《民约译解》(分别为1874年、1882年译本)等。从1867年至1889年,日本人翻译的有关近代经济学说的西书达186种,涵盖美、英、法、荷、德、奥等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涉及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两大流派,像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代表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1884至1888年间被完整而准确地译出;德国保护主义经济学说的圭臬——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译本,也在1889年出版^[27](杉原四郎:《自由主義と歴史学派》,第137-139页)。此外,反映进步史观的西人史学著作,如基佐著《欧罗巴文明史》(永峰秀树译)、巴克尔著《英国开化史》(大岛贞益译),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的《百一新论》(西周著)、《哲学字彙》(井上哲次郎编)、《近代哲学史》(Victor Cousin著,竹越与三郎译)、《理学沿革史》(Alfred Fouillee著,中江兆民译)、《理学钩玄》(中江兆民根据Adolph Frank的《哲学词典》译编)等,也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问世^[19](第260-361页)。

就近代西方人文社会学说译介所产生的影响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福泽谕吉与中村敬宇成为最受欢迎的著作家与翻译家,由他们分别撰、译的《西洋事情》、《西国立志编》,成为日本当时三大畅销书中的两种(前者各种版本的发行总数达20至25万册,后者则不下百万册),且都曾被指定为学校教材^①;斯宾塞的著作,深刻影响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以至于明治政府的高级官员,并被东京大学、庆应义塾等校用作教科书,其思想在哲学、政治学、史学、文学等各领域被广泛援引^②;中村敬宇所译《自由之理》“成为民权思想的圣典之一”;中江兆民所译《民约论》尚未正式出版,即被广为传抄,推动“自由民权之说如决积水,不过二三年,海内靡然”^[28](第92页);^[29](第18-19页);《欧罗巴文明史》也是“知识阶层的必读书,……其原著和英译本还是公私中等教育课程的教材”,《英国开化史》中的“历史观在文明开化时期的日本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③;加藤弘之所译《国法泛论》等书为近代日本国家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英法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特别是德奥保护主义经济学说为近代日本经济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

第四,重视掌握西方近代人文社会学说的人才,并为之提供发挥作用的舞台:如前述,明治政府对原属幕府的了解西方近代人文社会学说的人才一律予以重用,到1873年,又由政府要员森有礼召集他们组成著名的“明六社”,探讨涉及政治、法律、外交、经济、财政、社会、哲学、妇女、宗教、教育、历史、科学等众多方面的问题,追寻其原理,并通过定期举行演讲、发行《明六杂志》宣传其观点,对日本学界乃至社会作出示范^④,该社于1875年解散后,其成员依然得以在政界、军界、学界与报界大力从事传播西学的工作。此外,海军军官永峰秀树、政府机构译员大岛贞益,都没有因其身分妨碍各自译介影响巨大的《欧罗巴文明史》、《英国开化论》与李斯特经济学著作。与此同时,日本还注意培养新的同类人才:在维新后不久制定外派留学生政策,即明确提出以培养“通达其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制度文物学术技艺及其他百科”的人才为目的^[30](第184页),而中江兆民和马场辰猪这些传播西方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著名人物,正是从明治政府派到法国的留学生中涌现出来的,中江兆民回国后,除了译述之外,还兴办“法兰西学舍”,弟子达两千之多^[29](第19页);再从涵盖语言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科在日本高校中的位置来说,1870年明治政府在制定大学规则时,就将“文科”作为五科之一,而1877年正式成立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一共四个学部中文科居半(即法学部与文学部)^[20](第183页),其与福泽谕吉在维新前就创办的“庆应义塾”、大隈重信在1882年办起的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等,教学与研究在当时都主要建立

在西方近代人文社会学说基础上,成为日本这方面新的人才的主要摇篮。

三

前面所述,已足可证明:日本在明治变革时期,对于西学的确是从物质技术、制度乃至精神诸层面予以了解和吸收的,并以相关制度为此提供了保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日本社会中不存在坚持认为西学所长只在技艺、而要捍卫所谓“东洋道德”的势力,我们也不能无视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抬头的所谓“日本主义”。但问题在于,前者不足以改变当时日本对于西学的基本态度,后者也并不等于一概拒斥西学中的制度、精神层面。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号称“王政复古”,当政者为巩固天皇权威,曾设置地位很高的“神祇官”(后相继改为“神祇省”、“教部省”),试图使传统的“神道”成为日本的“国教”。但就在同时,他们也以相当大的热情与精力将视线投向西学的各个层面。实际情况是,树立“国教”并未取得预期进展,就连“教部省”,也在成立半年后就被并入文部省,且在5年之后撤消。而合并了教部省的文部省,在明治变革的前半期,毋宁说是“文明开化”的先锋,致力于促进学校的近代化、通过海外留学制度和聘请西人到日本以吸收西方文化^[31](第430页)。此外还应注意的,明治维新伊始,政府为推动教育复兴,曾设立“皇学所”(研究、传授日本的“国学”)和“汉学所”,并让“国学家”与“汉学家”进入政府的教育机构“学习院”,但他们很快就与“洋学家”的矛盾斗争中败北,“皇学所”与“汉学所”也只存在不到1年就被废除。到1887年,并上圆了创办日本第一所专门的文科大学——哲学馆(后来的东洋大学),虽主要研究和讲授神、儒、佛的哲理,但同时也讲西洋哲学史^[30](第168-169、213页)。应该说,至少在明治变革的前半期,固守“东洋道德”的势力对社会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很微弱的。

1881年前后,随着天皇制国家机器的逐步完备,明治政府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加紧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在此背景下,以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为代表的一派人,大肆宣扬“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试图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确立为国家指导思想。但这种主张遭到政府重臣伊藤博文等人的抵制^[31](第531-536页),此外,同样担任过天皇侍讲、后成为东京大学校长的加藤弘之,此时虽也是天皇制的忠实走卒、与民主思想相对抗,但却并不愿退回到以“东洋道德”为立国之本的立场,而致力于从社会进化论和德国国家主义学说中寻求服务于天皇制国家的思想理论^[26](第49-50页)。这样,在19世纪80年代制定明治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过程中,维护天皇专制权力的基本理论根据并非源于“东洋道德”,而是来自德国的君主立宪学说。其间,伊藤博文等奉明治天皇之命,1882年赴欧洲,“就欧洲各立宪君主国之宪法,寻其渊源,考其沿革,视其现行实况,研究利害得失所在”,并接受德、奥宪法学家古耐斯特、斯坦因的学说^[32](第485页),这对于宪法指导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可见,即使到明治变革的尾声,日本也没有进入“东洋道德与西洋技艺相结合”的模式,对西学的关注并没有收缩到物质技术这一个层面,除非我们将德国国家学说摒于西学之外,或与“东洋道德”相等同(实际上,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的经济学说也开始在日本大行其道)。

自1887年三宅雪岭等创办《日本人》杂志,所谓“日本主义”开始抬头。这一派鼓吹弘扬日本“国粹”,批判明治政府为取悦西方列强而推行的“欧化主义”,似乎是要抬出“东洋道德”作为国民的精神支柱。但是,他们毕竟长期经历了西学多层面的广泛传播,因此并不一概拒斥西学的制度、精神层面。这可由该派主力之一陆羯南在1889年的一段名言来证明,内曰:他们对“泰西文明之善美非不之知,重其权利自由及平等之说,敬其哲学道义之理,即其风俗习惯亦有所爱,最羡慕其理学经济实业之事”,因此,他们“并非狭隘之攘夷论之再举”^[31](第538页)。

综上所述,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对于西学的基本态度,是多层面地学习与吸收,决不可与同时期中国洋务派所遵循的“中体西用”相提并论。所谓“东洋道德与西洋技艺相结合”的“日本发展模式”,实为虚

构;说日本当时对西学的吸收是由物质技术层面逐步扩展到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也是臆断。

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对西学之所以持上述态度,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场变革是广泛的近代化运动,而日本自身的近代思想文化资源又远不能与之相适应,由此产生了对属于近代思想文化范畴的西学(其中也包含如德国国家主义那样的消极因素)的迫切需要;此外,也是由于日本在德川时代长期主动接触西学而不断加深对它的认识,到明治变革发生时,已经突破了所谓西学优长只在于“技艺”的谬见,使之不致成为妨碍多层面学习、吸收西学的思想桎梏。

注 释:

- ① 所谓明治变革时期,是指从1868年维新开始到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这段时间,因为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制度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正是在此期间全面展开并基本完成的。而明治宪法颁布之后,社会变革本身已不是日本实际面对的主要课题了。
- ② 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苏中立:《“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
- ③ 中村敬宇《留学奉愿候存寄书付》,转见大久保利谦:《幕末维新の洋学》,东京,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229-230页。
- ④ 大久保利谦:《明治の思想と文化》,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10页;沼田次郎:《洋学》,吉川弘文馆,1989年版,第230页;板田吉雄《日本近代化的开端》,载阿达斯·巴克斯编、梅溪升主持翻译:《近代化の推進者たち:留学生・お雇い外国人と明治》,京都,思文阁1990年版,第86页。
- ⑤ 参见幕末明治初期西洋文明导入研究会编:《洋学事始》,东京,文化书房博文社,1993年版,第165-179页;石附实:《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学史》第7章至第10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饭田贤一《日本における近代科学技術思想の形成》,载饭田贤一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4《科学と技術》三之3、4,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版。
- ⑥ 参见冈光夫等编著:《日本经济史》,京都,密涅发书房,1991年版,第194页;大岛清等:《人物:日本资本主义》1《地租改正》,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版,第2部第1章。
- ⑦ 参见福泽谕吉著《福泽谕吉自传》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9页;松泽弘阳著:《近代日本の形成上西洋経験》,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278页;井上光贞等编《日本歴史大系》13,《明治国家の成立》,东京,山川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 ⑧ 参见山本芳明在《翻訳の思想》中对《社会平权论》的介绍。
- ⑨ 参见矢岛翠在《翻訳の思想》中对于这两本书的介绍。
- ⑩ 《明六杂志》平均每期发行量为3205份,演讲的听众来源广泛,从华族到普通知识青年皆有。参见大久保利谦:《新修明六社考》,载前揭《明治の思想と文化》。

[参 考 文 献]

- [1] 松村明,等. 日本思想大系 35:新井白石[Z]. 东京:岩波书店,1975.
- [2] 广濑秀雄,等. 日本思想大系 65:洋学(下)[Z]. 东京:岩波书店,1972.
- [3] 沼田次郎,等. 日本思想大系 64:洋学(上)[Z]. 东京:岩波书店,1976.
- [4] Donald Keene,芳贺徹. 日本人の西洋発見[M]. 东京:中央公论社,1968.
- [5] 冢谷晃弘,等. 日本思想大系 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Z]. 东京:岩波书店,1970.
- [6] 佐藤昌介,等. 日本思想大系 5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Z]. 东京:岩波书店,1971.
- [7] 山崎正董. 横井小楠遗稿[Z]. 东京:日新书院,1942.
- [8] 板泽武雄. 日本とオランダ——近世の外交・貿易・学問[M]. 东京:至文堂,1978.
- [9]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自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0] 植手通有. 日本の名著 30 西周・加藤弘之[Z]. 东京:日本中央公论社,1972.
- [11] 堀经夫. 明治经济思想史增订版[M]. 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1991.
- [12] 松泽弘阳. 近代日本の形成と西洋経験[M]. 东京:岩波书店,1993.

- [13] 大岛清,等. 人物・日本资本主义3 明治初期の企業家[M].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
- [14] 芝原拓自,等.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2:对外观[Z]. 东京:岩波书店,1988.
- [15] 大久保利谦. 岩倉使節の研究[M]. 东京:宗高书房,1976.
- [16] 大久保利谦. 明治の思想と文化[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88.
- [17] 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18] 加治隆一. 兆民选集[M]. 东京:岩波书店,1936.
- [19] 加藤周一,等.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5: 翻訳の思想[Z]. 东京:岩波书店,1991.
- [20] 尾形裕康. 日本教育通史[M]. 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8.
- [21] 丝屋寿雄. 大村益次郎:幕末維新の兵制改革[M]. 东京:中央公论社,1971.
- [22] 森岛通夫. 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 [23] 日本史籍协会. 大久保利通文书,第5卷[Z].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
- [24] 菅野和太郎. 日本会社企業発生史の研究[M]. 东京:岩波书店,1931.
- [25] 加藤俊彦. 本邦銀行史論[M].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
- [26] 田中浩. 近代日本と自由主義[M]. 东京:岩波书店,1993.
- [27] 长幸男,等. 近代日本经济思想史[M]. 东京:有斐阁,1969.
- [28] 幕末明治初期西洋文明导入研究会. 洋学事始[M]. 东京:文化书房博文社,1993.
- [29] 河野健二. 日本の名著 36 中江兆民[M]. 东京:中央公论社,1970.
- [30] 石附实. 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学史[M]. 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
- [31] 家永三郎. 日本史资料:上[Z]. 东京:东京法令出版株式会社,1973.
- [32] 江村荣一.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9: 宪法构想[Z]. 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Japanese Elementary Attitude towards Western Learning in Meiji Era

LI Shao-jun

(School of Chinese Cultural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 Shao-jun (1958-), male, Professor, Chinese Cultural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bstract: The course of the change of the Japanese attitude towards Western Learning since 18th century, the governors' and the enlightened thinkers' ideas and actions to Western Learning in Meiji era, and the actual state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Japan and influencing Japanese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these aspects, the Japanese elementary attitude towards Western Learning was to emphasize neither the "skill" only nor the gradually expanding the material technology level into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olicies, but to study and absorb it in multi-levels. Besid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Japan's conservative force then had no enough power to change the elementary attitude.

Key words: Japanese; Meiji era; western learning